

## 一 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区别

在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中,国际政治领域被理解为物质实在,这种物质实在独立并外在于人类的活动,因此,它们的行为方式被认为是客观的存在,等着我们去发现。国际关系学就是对它进行一种客观的事实陈述。国际关系学者可以像寻求自然界的规律一样,能够对国家之间的行为方式加以把握和认识,他们对本体论的理解主要限于国际关系到底是由什么事物构成:国家、个人、集团还是阶级。这实际上是一种实体主义。由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物质实在本体论看不到行动者的反思和实践力量,因而把国际体系的结构看成脱离于行动者的外在之物,完全操控行动者的行为,所以主流理论只注意国际关系的因果规律,而忽视了行动者之间在互动过程中的意义建设。建构主义的本体论则是一种社会本体论,也就是说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并不是独立于我们的物质事实,而是我们活动的产物,即社会实在或社会类别。国际关系实际上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它是一种社会事实,国际政治理论应该是对社会实在建构的解释。社会实在具有主体间性的(intersubjective)和集体意义的性质。主体间性的意义并不是个体信念的集合,而是作为集体知识或共同知识存在,但这种集体知识为所有具备从事社会实践资格的个体共同拥有。一旦把国际关系当做一种社会实在来理解,那么,国际关系中的行动者就是一种具有意图和目的的行为体,它们在互动过程中建立起主体间性的理解和共享的结构,这种结构并不脱离行动者,而恰恰由行动者不断地再现和生产出来。行动者和结构之间是一种相互构成的关系。这样国际体系的结构实际上是主体间性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约束行动者的行为,而且还定义行为体的性质。正是本体论上的差异,建构主义对主流理论的核心概念,如无政府状态、权力和利益等进行了另一番透视。

## 二 不同的本体论影响了方法论的取舍

由于建构主义不仅关注因果问题,而且更强调主体间性的意义,即社会实在的建构问题,因此,它一方面拓展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范围,同时,在保留了以前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大量借鉴了其他人文主义或诠释主义的方法,如谱系学、常人方法学、符号学、叙述分析、认知图谱法和象征分析等,这些都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没有的。值得注意的是,对国际关系的社会本体论理解,使语言学成为国际政治分析的一种重要方法。因为主体间性意义的建构必须依靠语言来完成。语言不仅描述实在,而且还建构实在。话语里面充满了规范因素,也是一种变化的力量。一些学者开始利用语言学来研究国际政治。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克托齐威尔和奥纳夫在1989年就把言语行为理论引入到国际关系分析之中,最近,瑞森·卡朋利用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和争论理性分析德国统一问题以及公共话语空间对国际人权规范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维弗尔的安全化概念也来自语言学对安全研究的启迪。

从建构主义的本体论对方法论取舍的影响看,国际关系方法论的选择是和本体论密切相关的。实际上,国际关系学者在面对所研究的世界时,心目中都有一个本体论上的考虑,也就是说如何想像国际关系:它是一种外在于我们的物质实在,还是我们建构起来的产物。当然,如果把国际关系看成是建构之物或社会实在,按照涂尔干的方法来对待也并非不可以,不过,即使这样,我们也可以沿另外的路径来分析行动者的行为,诠释学或人文主义的方法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种。社会科学中的科学方法和人文方法的争论实际上反映的是本体论上的差异。因此,在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论进行思考时,本体论的观照是不可缺少的。

# 国际关系研究中使用科学方法的意义

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我国国际关系研究比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有较大差距,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一学科起步较晚,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知识不够普及,尚不能区别概论、理论和研究方法;受过方法论专门训练的研究人员较少,形不成一致的学术评判标准。

## 科学研究方法与其他研究方法有什么不同

一般来讲,研究方法可以分为科学的、宗教的、直觉的、猜想的、思辨的……这些方法都包括主观分析的环节,但与其他方法相比较,科学方法更强调客观实证。从广义上讲,我们可以把国际关系的多种研究方法都归为科学的方法,但是如果从狭义上讲,以程序性、实证性和共同规则为科学研究方法的标准,则可以将科学方法与其他研究方法区别开来。如历史比拟法、简单经验归纳法、哲学思辨法等等。科学研究方法的程序至少要包括发现问题、提出假设、概念操作化、实证检验、得出结论几个环节。如果一种研究方法不包括概念操作化与实证检验这两个环节,这种方法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方法。科学方法要保证研究过程与结论都可公开检验,因此科学方法要求以共同规则确定标准,而没有相同标准就无法做任何检验。

## 国际关系研究中采取科学研究方法的意义

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属于科学范畴,因此,它们最基本的共性就是都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科学研究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科学的方法可以解决很多其他研究方法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科学方法的意义主要体现在:

1. 科学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变量控制是科学方法中分析影响同一事物相关因素之间关系的主要手段。与简单经验归纳法不同,变量控制不但可以发现与事件相关的要素,而且可以认清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运用科学方法可以深化我们对国际关系规律的认识。

2. 科学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事物的变化程度。科学方法既可以定性分析,也可以定量分析。而科学方法的操作化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定量分

析。定量分析不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事物的发展方向,而且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事物变化程度。而非科学的方法就难以做到这一点。科学研究方法可以细化我们的国际关系知识。

3. 科学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提高预测的准确率。科学方法强调实证或实验,其目的在于提高结论的可重复性(即普世性)。而结论重复性的提高就增强了结论的可靠性,从而也增强了结论的预测准确程度。科学方法有助于提高对国际形势变化的预测水平。

## 科学研究方法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意义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我国国际问题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多年来大家一直在谈论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这一问题可能与科学方法不普及有关。现代科学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不断更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普及科学的研究方法将有助于改变低水平重复的现象。要提高中国学术界对国际关系认识的准确程度,现在还没有比科学方法更有效的方法。目前,有关方法论的教材中,只有科学的研究方法成系统,其他的研究方法还不成系统。

提倡科学研究方法有助于纠正不良的学风。大家都反对学界的浮夸现象,学术打假是惩罚措施,还需要通过提倡科学研究方法培养学术道德。使用科学方法有助于防止制造含义不清的新词,有助于防止无明确逻辑关系的因果解释,有助于防止不在乎结果的形势预测。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开放性,认为自身是不完善的和需要改进的,因此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培养研究人员承认错误的品德和改正错误的勇气。

科学方法的普及有助于我国国际关系的学术批判,促进学术进步。科学研究方法在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还未普及,但现在已经出现了对其批判的势头。学术批判是学术进展的重要动力,但如果学术批判是感情的而不是科学的,其结果不但起不到促进作用反而会制造个人恩怨。这种结果使得我国学术批判很不普遍。科学方法有共同标准,批判者学习了共同标准后所进行的批判才可能是内行的批判。为了提高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科学水平,我们需要多些人先学习科学方法,然后进行内行的批判。